

浅议北魏“子贵母死”制度

冯素梅

摘要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立储制度是政治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很长时期实行“子贵母死”制度,即皇子一旦被立为储君,其生母必须被赐死,这项看起来很残忍的制度对北魏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北魏政治 立储制度 “子贵母死”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立储制度是政治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了皇位的顺利继承、皇权的巩固,都曾挖空心思地寻求不同的形式。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实行“子贵母死”制度,即皇子一旦被立为储君,其生母必须被赐死。“子贵母死”制度始作俑者为道武帝拓跋珪,在宣武帝生母胡太后之前,历任储君的生母都被严格地依制处死,这项看起来很残忍的制度对北魏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道武帝设立“子贵母死”制度的初衷

《魏书·太宗纪》载:“初,帝母刘贵人赐死,太祖告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1]这是提到的汉武帝之事,是指汉武帝杀钩弋夫人而立汉昭帝为皇太子。道武帝拓跋珪表面上远循汉武故事,实际上是针对拓跋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作出的决策,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二是避免外家即后族为乱,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新兴的北魏王朝“长久之计”。

1. 恒代之遗风——北魏以前拓跋社会母后干政现象寻踪。

在道武帝建立北魏以前,拓跋社会更像是在国家机器面前徘徊的松散的部落联盟,拓跋部的首领是部落联盟的酋长。拓跋旧制,“七族”、“十姓”血缘相近,“百世不通婚”,拓跋婚姻必取之拓跋以外部落。拓跋居部落联盟领袖地位,其君后和母后的部族一般具有相当实力。这种联姻是一种政治婚姻,拓跋部给与之通婚的后族带来了利益,同时其首领地位也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与此同时,君后或母后以及后族(即外家)对拓跋部的朝政的干预能量成正比增长。

北魏建国之前,拓跋部落联盟中母权干政较早、较突出的事例是桓帝后祁氏摄国之事。据《魏书·序记》中记载,祁氏所生长子普根立月余而薨,祁氏就立了普根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普根之子当年冬天又死了,沙漠汗少子弗之子郁律立,祁氏以郁律“姿质雄壮,甚有威略”,又得众心,惟恐对自己的儿子不利,就将其害死。此后,拓跋部就出现了所谓“太后临朝”的现象,祁氏临朝后,派使臣与石勒通好,时人谓之“女国使”^[2]。

祁氏之后,平文帝皇后王氏、昭成帝皇后慕容氏都曾对拓跋部的重大事务产生过干涉作用。《魏书·平文皇后王氏传》载,昭成帝时想筑城定居,改变鲜卑族迁徙的生活习惯,因亲生母亲王氏的反对而未果,同传又载,烈帝死后,国祚殆危,当时身为太后的王氏成为左右最高权力的力量,“兴复大业,后之力也”^[3]。昭成帝皇后慕容氏是道武帝的亲祖母,《魏书·昭成皇后慕容氏传》载,慕容氏沉厚善决断,专理内事,昭成帝对其每事多从,她不仅参与了拓跋部内的重要政治事务,而且对外部的形势和发展方向也能作出准确地判断^[4]。

拓跋部脱离原始社会时间不长,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很浓

厚,道武帝建立北魏王朝,是要建立以君权、男权、父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因此,拓跋历史上以祁氏、王氏、慕容氏为代表的母权制的社会秩序就成为必须摒弃的。

2. 卵翼之下——道武帝本身经历影响。

上述祁氏、王氏、慕容氏以母后身份干政之时毕竟离道武帝比较遥远,真正令道武帝实施“子贵母死”这项如此残忍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他的亲生母亲献明皇后贺氏。道武帝早年的经历及成年后的创业,无不受其亲生母亲贺氏的强烈影响。

献明皇后所出身的贺兰部是拓跋部落联盟内一支强大的部落,道武帝幼时,拓跋代国被前秦所灭,他很可能是母亲贺氏及贺兰部的左右下,缚父请降,到前秦都城长安后,获罪被徙往蜀地。在道武帝重返代北后,母子一度流亡独孤部。独孤部刘显意欲谋害道武帝,贺氏设计使他躲过一劫,逃奔贺兰部。刘显部发生动乱后,贺氏也回到了贺兰部。道武帝受到了贺氏之兄贺兰部首领贺讷的欢迎,但贺氏之弟贺染干常常带兵逼贺氏母子行轶,在此剑拔弩张的危难时刻,贺氏挺身而出,斥退了贺染干。最后,在贺氏之兄贺讷及其他人的拥护之下,道武帝终于在牛川登上了代王位。

道武帝在建国立业过程中,松散的部落联盟形式渐渐成为拓跋部发展的绊脚石,专制集权的封建制度成为前进的方向。于是道武帝进行了对部落联盟内部其他部落的大规模征伐,道武帝12年创业,全是在战争中度过的,重要的战争对象主要是其母后之族贺兰部和妻族独孤部。最先是因独孤部刘显迎来道武帝叔父窟咄与道武帝争位,道武帝在困境中联络幽州慕容部将窟咄部消灭了。接着就是与独孤部刘氏各部反反复复的战争。道武帝争取了刘卫辰的部落,纳卫辰之妹为妻,其余独孤部落则是分别加以征服,强迫迁徙它处,再叛再徙。与此交错进行的还有与贺兰部的战争,反复更多,其结果与独孤一样,一部分归附,大部分被征服,被强徙。不论贺兰、独孤,归附的部分都是其部落组织被离散,部落大人同于编户齐民。至于被征服、强徙的部落,自然更是丧失部落特权。在此过程中,也夹杂了一些与它部族的战争,但又多与攻击贺兰部、独孤部有关。

道武帝早年在其生母贺氏的卵翼下生存,多次因贺氏的保护周旋转危为安,又是在贺氏之族贺兰部首领的拥立下登上王位,贺氏及贺兰部这种影响力另一方面却成了对道武帝最大的威胁。独孤部是道武帝之妻刘贵人之族,曾因拓跋社会“兄终弟及”制之风拥护道武帝之叔父窟咄,早已成为道武帝的主要对手。刘贵人即为明元帝生母,为避免明元帝即位后如自己受生母贺氏及贺兰部的影响一样,受到刘氏的左右及外家独孤部的威胁,道武帝纵览古今,痛定思痛,作出了将明元帝之母赐死的决定,并将它变成后宫常制,形成“子贵母死”制度。

二、“子贵母死”制度实施的后果

道武帝设立“子贵母死”制度,目的是为了以防母后干政,外

家为乱,但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后果。

1.造成父子反目,引发了清河王政变。

北魏天赐六年(409),道武帝决定立长子拓跋嗣为皇储,于是依“子贵母死”制度,赐拓跋嗣之母刘贵人死,拓跋嗣对其父的做法难以理解,被迫出走。道武帝不得已,就打算改立次子清河王拓跋绍为皇储,因此又将清河王绍母贺夫人囚禁起来,准备杀死。贺夫人密派人送信与其子清河王绍,拓跋绍闻信,即与帐下密谋,发动政变,串通平城皇宫宦官和宫人,爬过宫墙,潜入道武帝的住所天安殿,将道武帝杀死。清河王政变后来被拓跋嗣平定,拓跋嗣成为北魏王朝第二代皇帝——明元帝。

2.使丧母储君的乳母或保母得以登上政治舞台。

道武帝设立“子贵母死”制度后,身后各代都严格地依制执行,但丧母的储君大都年龄幼小,需要乳母或保母的抚养照顾,储君对自己的乳母或保母自然就具有了如母子般特殊的感情,一旦即位后,乳母或保母就被新君奉为母后,甚至给予皇太后的待遇。乳母或保母出身卑微,本来不可能擅掌外朝权力,但却因与皇帝有个人亲密关系,就在日后为皇帝择后宫、立储君及其他朝政大事中发挥重要作用。太武帝保母奚氏及文成帝乳母常氏,都曾对当时政局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奚氏为太武帝保母,《魏书·明元密皇后杜氏附世祖保母奚氏传》载,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明元帝命她为太武帝的保母,太武帝生母杜氏因“子贵母死”制度而死,故太武帝对其保母奚氏“感其恩训,奉养不异所生”,即位后尊奚氏为“保太后”,后尊为皇太后。奚氏凭着自己受到的恩遇,不仅使自己的弟弟受封为辽东王,而且积极干预朝政,同传称她“训厘内外,甚有声称”,她干涉朝政最典型的事例是太武帝太延五年(439)亲征凉州时,蠕蠕即柔然入寇京师,奚氏不听从大臣躲避的奏请,而是命诸将出击,缓解了危机^[5]。

文成帝乳母常氏的地位与奚氏同样显赫。《魏书·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附高宗乳母常氏传》载,常氏本是辽西人,太武帝时“以事入宫”,成为文成帝的乳母,正平事变及宦官宗爱篡权时,常氏对文成帝有劬劳保护之功,文成帝即位后,同样被尊为“保太后”、“皇太后”。常氏不仅位极荣宠,而且左右北魏后宫政治风云,借北魏旧制“子贵母死”制度,赐死了献文帝的生母李氏,立了与自己更接近的冯氏为后,为冯氏后来临朝称制奠定基础^[6]。

3.文明太后冯氏临朝称制成为这项制度最大的反差。

道武帝设立“子贵母死”制度的初衷是为了防止母权专政,但这一矫枉过正之举却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母权专政,即乳母或保母专政,更有甚者,即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依靠这项制度排除了自己最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以太后之尊尽乳母之责,躬亲抚养年幼的皇储孝文帝,从而在孝文帝即位后达到一生政治权力的巅峰。

文明太后冯氏是文成帝的皇后,她本为汉人,出身于北燕皇族,《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载,因父事株连坐入宫,受到其姑母冯昭仪的照顾。文成帝子献文帝出生后,其生母被保太后常氏依“子贵母死”制度赐死,这为冯氏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再加上冯氏按照北魏后宫旧制铸成了金人,从而顺利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献文帝即位后,冯氏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后。冯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有非凡的远见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在平定乙浑之乱中,冯太后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从而开始第一次临朝听政。与献文帝的政治斗争逐渐激化后,冯太后借鉴奚氏、常氏凭借抚养储君而专权的经验,以太后之尊抚养小皇子即后来的孝文帝,孝文帝即位,冯太后就实现了第二次临朝称制。孝文帝在冯太后生前,“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7],可见冯太后对孝文帝乃至北魏朝廷所具的影响力。

冯太后在以往的宫廷斗争经验中,看到了“子贵母死”制度可以成为剪除异己的有力武器,所以一直坚守“子贵母死”之制,除赐死储君之母以外,甚至诛戮储君的母族。孝文帝之子出生,“生而母死”,就是不待立储之日,其母林氏即被赐死。孝文帝曾经想废除此制,挽救妻子林氏生命,但以不能逆冯太后旨意而未能成功。冯太后不但自己掌握了两代储君,还引诸冯氏女入宫,其中二人后来相继被立为孝文皇后。而且,这些冯氏女当权后也效法其姑故伎,夺取新产皇子而母养之,赐其母死。因此,由文明太后开端,诸侄效尤,子贵母死之制不但未得废除,而且更形巩固,并演化为强人倾轧的残酷手段,在迁洛以后的北魏后宫之中继续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

孝文帝临死前才下决心剪除冯氏内外势力,但未及正式宣布废止子贵母死之制。直到宣武帝后宫胡氏产子逃过了各种暗算,三岁时立为储君,即后来的孝明帝,储君之母胡氏亦未赐死,即以后的明太后。胡太后是北魏一朝唯一凭血缘关系擅权的母后。至此,实行了百年的子贵母死之制事实上被废除了,但是北魏国祚事实上也终于此。

三、结论

在拓跋部落联盟时代,后族是拓跋部作为领袖地位强力的支撑,但道武帝建立北魏后,要树立一种超越一切之上的专制君权,这就必须要有一个集中权力的过程,其中包括剥夺母后和母族权力,特别是母族干预拓跋事务的权力,因此,将皇储的生母赐死的“子贵母死”制度,首先是符合拓跋部从部落联盟共主地位上升为专制国家皇帝地位的需要,其次是符合进一步消除和防止强大外家干扰拓跋事务的需要,故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其产生的深刻、合理的根源。

道武帝设立的“子贵母死”制度,初衷是不让母后和外家干预朝政,但由于丧母的储君年龄幼小,同抚养照顾其成长的乳母或保母建立了特殊的感情,即位后又赋予其相当于生母皇太后的尊荣,反而导致另一形式的女权干政,其中文明太后冯氏不仅间接地靠这项制度登上了皇后以及皇太后的尊位,而且通过尽乳母之责控制了年幼的孝文帝,最终达到其一生中政治生涯的顶点,这肯定是道武帝设立“子贵母死”制度之初不会想到的。

总而言之,“子贵母死”制度的渊源和演变,都是附着在拓跋部从部落联盟向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主线索上,其影响就不可避免地延伸至北魏中晚期历史中。

参考文献:

- [1]魏书·太宗纪。
- [2]魏书·序记。
- [3]魏书·平文皇后王氏传。
- [4]魏书·昭成皇后慕容氏传。
- [5]魏书·明元密皇后杜氏附世祖保母奚氏传。
- [6]魏书·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附高宗乳母常氏传。
- [7]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冯素梅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副研究员
(责编 樊 誉)